

王夫之“拟议变化”的《诗》论观

高文霞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明清之际,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宗旨研经立说。其《诗》学著作《诗广传》对《诗序》的众多突破与发展,在当时的《诗经》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得益于其“拟议变化”的《诗》论观。在“拟议变化”《诗》论观烛照下,王夫之沿着经世致用的解经思路,将《诗经》阐释与时代风气和政治紧密结合,能够对《诗经》学讨论的传统问题提出新见,开拓新的解《诗》路径,体现了明清之际遗民经学的学术风貌。

关键词:王夫之;《诗广传》;《诗序》;“拟议变化”

中图分类号:I 207.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5)03-0040-05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5.03.007

王夫之在抗清失败后隐居山中,本着“六经责我开生面”^{[1](P73)}的宗旨研经立说,因而《诗广传》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表达了明清之际这位伟大理学家对现实人生的忧患和思考。《诗广传》对《诗序》的众多突破与发展在当时的《诗经》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得益于“拟议变化”的《诗》论观,目前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尚不充分。本文拟从天人关系和“《诗》达情”说两个方面,阐述王夫之“拟议变化”《诗》论观对《诗序》的变化,并探求产生变化的具体原因。

“拟议变化”一词出自《周易·系辞》“拟议以成其变化”^{[2](P519)},本是指事情要获得成功重在预先谋划,王夫之把它解释为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他在《〈诗传〉合参·序》一文中说:“学,效也……觉者,天理之舍,古今之府,以效古人而自觉者也……觉生于拟议,而效成乎变化,斯以悦心研虑而无所疑。”^{[3](P131)}“拟议”是“效古人”,也就是继承;“变化”即改变、创新的意思。王夫之虽然说“拟议变化”“如目视之与手举,异用而合体”,^{[3](P131)}但他更重视“变化”,认为“变化”才是最终目标,“拟议”也是为了实现“变化”,所以王夫之提出“义理可以日新”^{[4](P170)}的说法。同时他还把“拟议”解释为继承前人敢于变革的精神,他说:“子夏氏于素绚之《诗》,同堂而异意,

故能效夫子之变化以俟朱子。朱子于三百篇正变贞淫之致,同道而异论,故能效子夏之变化以俟后人。善效朱子者,可以知所拟议矣。”^{[3](P131)}在他看来,真正懂得拟议的人,是要效仿古人的求变精神,而不是一味的模仿沿袭。

王夫之“拟议变化”《诗》论观与明清之际“汉宋兼采”解《诗》潮流相一致并有所超越。洪湛候说:“论《诗》杂采汉宋,几乎是清代前期的一种普遍倾向,论者在著作中引据前人的说解,往往汉学、宋学兼而及之,多数稍偏于汉。”^{[5](P457)}钱澄之《〈田间诗学〉凡例》中说:“《小序》去古未远,其世次本末虽未可全据,要不大谬也……《集传》半遵毛、郑,间出己意,明白易简,迥出于《毛传》《郑笺》之外,确不可易矣,而亦有过于拘泥者。”^{[6](P396~397)}这一说法颇能代表当时的普遍认识。但《诗广传》对《诗》的解释不仅仅限于“汉宋兼采”,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阈。不仅讨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诗序》和《诗集传》的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宗法、兵制、赋税、礼乐、文学等广泛领域,而且敢于对《诗序》和《诗集传》这两部权威著作提出反对意见。

王夫之的“拟议变化”《诗》论观能够跳出宗汉或宗宋的藩篱,以自身感受为出发点,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去解读《诗经》,体现了他“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治学宗旨,比同期那些龃龉于汉宋之争的《诗》学著作表现出了更多独立性和创新性。

收稿日期:2015-04-02

基金来源: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B13wx008)

作者简介:高文霞(1976-),女,河北正定人,在读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二

《诗序》中有四篇涉及到了天人关系,分别是《大明》篇:“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7](P539)}《皇矣》篇:“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7](P566)}《下武》篇:“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7](P580)}《洞酌》篇:“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亲有德,飡有道也。”^{[7](P621)}都表现了天主宰人,人应敬天、以德政顺应天道的天人合一观,与周代的天命观基本一致。王夫之论及天人关系的篇目主要有十篇:《麟趾》《小星》《邶风·柏舟》《既醉》《板》《荡》《桓》《长发》《大明》《皇矣》。涉及的篇目除《大明》《皇矣》外与《诗序》均不同,表达的思想既有对《诗序》的拟议,又更多体现的是变化。这十篇中,前三篇在《诗序》基础上引申出天人关系,中间五篇则抛开《诗序》直接讨论天人关系,最后两篇,虽然与《诗序》都讨论到了天人关系,但所体现的天人观念与《诗序》并不相同。可以看出,王夫之不对《诗序》亦步亦趋,秉承“拟议变化”的《诗》论观,完全表达自己的读《诗》感受。

王夫之对《诗序》天人思想的拟议不是因袭具体篇目的说解,而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如在《长发》《麟趾》《小星》等篇中,王夫之也表达了敬天、顺天的观念,提出要“知天命”,与《诗序》所表达的天人观相同。他说:“事天于其事,顺而吉,应天也;事天于其无可事,凶而不咎,立命也。”^{[4](P306)}并举吴淦、元吉等人之祸表达顺天安命勿妄为的思想。

王夫之天人观最耀眼之处在于他对人道的极度高扬,这也是他对《诗序》的最大变化之处。他特别突出了人道对天道的主导和决定作用。这一观点主要体现在对《皇矣》《板》《荡》等篇的论述中:

天之有求于人而不能必得者也。先天而天或不应,后天而天或不终,吾于是而知天道。天欲静,必人安之;天欲动,必人兴之;吾于是而知人道。大哉人道乎!作对于天而有功矣。《《论〈皇矣〉一》》^{[4](P446)}

昔之为天之天者,今之为人之天也;他日之为人之天者,今尚为天之日也……入乎人者出乎天,天谓之往者人谓之来。然则全而生之,全而归之,日日而新之,念念而报之……《《论〈板〉三》》^{[4](P463)}

禽兽终其身以用其初命,人则有日新之命矣。有人之道,不谏乎天;命之日新,不谏其初。俄顷之化不停也,祇受之臍不盈也。一食一饮,一作一止,一言一动,昨不为今功,而后人与天之相爱如呼吸之相应而不息。《《论〈荡〉》》^{[4](P464~465)}

对“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

的解释,以往诸家重在强调天的意志,君王行德政也是迎合天的意志,王夫之敢于突破这一壁垒。在他看来,天不再是万能的主宰,它也有求于人道,它的动静、运行需要借助人的力量来实现,人由畏天而行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并能日日而新之。“天之天”只有经过人的积极参与,才能成为无穷无尽的“人之天”。天道与人道相依相存、共生不二,他的认识水平堪与今人相媲美。

因为高扬人道,王夫之对天人感应说及佛老之说表示了强烈反对:

善,吾知其吉也;恶,吾知其凶也。犹云集而必雨,非必肤寸之云为杯水之雨也。犹星陨而为石,非缘陨石故而星为之变也。……吉凶不爽之谓理,向威不测之谓天,一而已矣。类五行之应,铢铢而拟之,刘子政父子之不足与知天,久矣。《《论〈大明〉一》》^{[4](P440)}

不达其说者曰:“天唯以其灵授之有生之初而不再者也”,是异端“迴脱根尘,灵光独露”之说也,是抑异端“如影赴镫,夺舍而栖”之说也。《《论〈皇矣〉一》》^{[4](P453)}

王夫之认为天人感应之说荒诞不经,佛老之说违背了儒家重人道、重事功的传统,这些谬说不仅离经叛道、惑乱人心,甚至误国殃民,所以必须给予强烈批判。这一做法是对宋儒的拟议。张载、二程、朱熹等《诗》论中都有所涉及,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夫天岂有所憎而祸之乎?福善祸淫,亦自然之理而已。”^{[8](P171)}“夫为政不平以召祸乱者,人也。而诗人以为天实为之者,盖无所归咎,而归之天也。”^{[8](P169)}否定了天作为至上神拥有对世间万物赏善罚恶的无上权利,提出祸福均由人事造成的客观理性的天人观。

王夫之高扬人道的天人观体现了当时思想界的普遍认识,如孙奇逢说:“人定自能胜天也。”^{[9](P23)}黄宗羲说:“人力信乎可与天争矣。”^{[10](P188)}陈确说:“盖人道不修,而天道亦几乎息矣。”^{[11](P450)}但比较明清之际《田间诗学》《毛诗稽古编》《白鹭洲主客说诗》《诗触》《诗志》《毛诗日笺》等二十余种《诗经》学著作,对天人问题的阐发基本依从《诗序》或《诗集传》,因为他们都奉行汉宋兼采的《诗》论观。王夫之的《诗广传》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言他人所未言,无疑得益于其崇尚变化 and 创新的“拟议变化”《诗》论观。

《诗广传》中高扬人道与顺天安命两种思想并存,除了与儒家依天命与重人事并存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关外,还与王夫之“拟议变化”《诗》论观强调变化的主张有关。王夫之认为解《诗》要随时势变化而变化,才是学到了孔夫子的真谛。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诗广传》是康熙年间的修订稿,王夫之初次写作与二次修订时的心境有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影响

到他对《诗经》的理解,并体现在《诗广传》中。《诗广传》的写作时间据王孝鱼考证在康熙八年(1669年),据《船山年谱》载顺治十四年(1657年),王夫之终于结束流亡生活,归隐石船山,抱着为生民继绝学的态度伏处穷谷,研经著书。他把著书作为另一种形式的“与义”,仍然保持着抗清时期的高昂斗志,十余年间完成了十余部经学著作。《姜斋五十自定稿》中所收诗篇对王夫之这一时期的心态有所反映,如《杂诗》(丁未年作,应为康熙七年)中说:“解我冲牙,以赠同仇……余生不再,余命不双。”^{[3](P256)}《杂诗四首》中有“壮士匣中刀,犹作风雨鸣”^{[3](P259)}之句,都表现了王夫之这一时期的积极奋进心态。《诗广传》曾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新修订,(据周调阳《王船山著述考略》考证)此时王夫之已将近古稀之年,清朝政府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彻底平定了各方反清势力,政权日益巩固,复明已无可能,王夫之此时不免会有万事蹉跎、顺天安命的思想。他在《和高季迪风雨》诗中说:“人事杳无绪,天情亦易迁。”^{[3](P382)}在《寒雨归自别峰庵寄同游诸子》诗中说:“壮心已分属,微绪望孤接。”^{[3](P384)}在《瓜圃夕凉》诗中说:“往昔从弃捐,今怀何缱绻。”^{[3](P385)}这些诗均收于《姜斋七十自定稿》,与其《序》中所说世“愈入于汗漫”^{[3](P379)}之情一致,都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之情。此外,王夫之心态的变化在作于顺治初年的《周易外传》和作于康熙年间的《周易内传》中也有所反映。如对《乾》卦的解释,《周易外传》中说:“天理日流,初终无间,亦且日生于人之心。”^{[12](P826)}又说:“故奖成与得,以著天理流行之功效,使知败与失者,皆人情弱丧之积,而非事理之所固有”^{[12](P826)},特别强调人的作用。《周易内传》中说:“夫人之情,皆健顺之几。天下无不可合之数,无不可用之物,无不可居之位,特于其相易者各有趋时之道,而顺之则吉,逆之则凶。”^{[12](P42)}又说:“此卦即在人事,亦莫非天德”^{[12](P44)},流露出顺天安命的思想。

三

王夫之“拟议变化”《诗》论观对《诗序》的突破尤其体现在他对“《诗》达情”说的认识上。《诗序》中明确提到“情”字的只有《邶有萋楚》一篇:“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7](P263)}在这里“情”仅指男女之情。《诗序》中常常出现的“美”、“刺”、“闵”、“思”也可算作“情”的表现,都表示“情感”,体现了《诗大序》“吟咏情性”^{[7](P19)}之说。《诗广传》中论及“情”的篇目约占四分之一,集中于《国风》和《小雅》,不仅篇目大大增加,“情”的内涵也远超出《诗序》“情感”的范畴。“《诗》达情”说对《诗序》的创新可分三种情况:一部分是在继承《诗序》基础上有所引申,有二十余篇,下面举数例以见其异同:

《燕燕》篇《序》为卫庄姜送归妾,《诗广传》由孤臣嫠妇论行可孤德不可孤,有余德才能贞其性。

《竹竿》篇《序》为卫女思归,适异国而不见答思而能以礼。《诗广传》由卫女能坦然于不见礼之侧引申论裕情。

《王风·扬之水》篇《序》为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诗广传》引申为论君子慎于治情,应善导民情。

《素冠》篇《序》为刺不能三年。王夫之引申为论述情与礼的重要性。

一部分弃《序》别论,共有近二十篇,比如对《关雎》《葛覃》的阐释,说《诗》者大都不敢跳出文王之化、后妃之德的圈子,就连反《序》激烈的朱熹也未能免,王夫之却能从政治角度讨论是否“达情”关乎国之存亡,有“余情”才能安天下等问题。

最值得注意的一部分是对《诗序》的反对,如《北门》《定之方中》《相鼠》《葛生》《北山》等五篇,表达了王夫之身处乱离之际对《诗经》的独特理解,最能体现王夫之的“诗达情”说对《诗序》的变化。具体对比如下:

《北山》篇《序》为刺仕不得志,《北门》篇《序》为大夫刺幽王役使不均。王夫之却认为写《北山》之诗的人“知己之劳,而不恤人之情;知人之安而妒之,而不顾事之可;诬上行私而不可止”^{[4](P422)},所以他称《北山》之诗“其词诬,其情私矣。”^{[4](P422)}他批评《北门》之士人“恤妻子之饥寒,悲居食之俭陋,愤交游之炎凉,呼天责鬼,如衔父母之恤,昌言而无忌,非殚失其本心者,孰忍为此哉!二《雅》之变,无有也;十二国之《风》不数有也。汉、魏、六代、唐之初,犹未多见也。”^{[4](P326)}简直欲把他们比作亘古以来最无耻之人,可谓发前人所未发。王夫之对他们痛加指责是因为他们汲汲所求的是一己私情,而非关涉天下的公情。

《定之方中》篇《序》为美卫文公,王夫之则批评文公“盟狄而不耻,灭同姓而不戚,背盟主即楚而不惭,君臣交讼,兄弟操戈而不恤。”^{[4](P333)}并认为《定之方中》之诗“其音亢,其词诮,先公温厚之教亦自此而无遗矣”^{[4](P333)}。

《相鼠》篇《序》为卫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无礼仪。王夫之则认为卫文公自己的言行就不合礼仪,《相鼠》一诗充满狂诮之气。

《葛生》篇《序》为刺晋献公好攻战,国人多丧。王夫之却认为“武、献之德于民也不薄矣。”^{[4](P368)}是因为“晋之为政于天下也,得之于《葛生》,相爱以生,相信以死”^{[4](P368)},能够导民情于爱。

可见,王夫之的“《诗》达情”说所提倡的“情”是公情,他对私情极力反对。王夫之说:“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心之所期为者,志也;念之所觊得者,意也;发乎其不自己者,情也;动焉而不自

待(持)者,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但言意,则私而已;但言欲,则小而已。”^{[4](P325)}“意”和“欲”代表了私情,也就是王夫之在《北门》中所反对的一己之情;“志”和“情”代表了公情,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天下为公”之情。王夫之特别强调诗要表达怀天下的大情怀,而不是纠结于个人私利的满足。所以他说:“《北门》之淫倍于《桑中》,杜甫之滥百于香奁。不得于色而悲鸣者,其荡乎!不得于金帛而悲吟,荡者之所不屑也,而人理亦亡矣。”^{[4](P327)}(王夫之对杜甫的评价不免有失客观,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明清之际因了时事变迁,有识之士对公情的关注和提倡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热情。黄宗羲反复论说诗要表达“万古之情”,而不能只说一己之情,他对士人“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10](P477)}和“惟自畅其歌哭,于世无与”^{[10](P371)}的做法极力反对。公情在具体的情感表达上,常常表现为真情、裕情;私情则表现为遽情、淫情。王夫之在《诗广传》中特别表达了对遽情和淫情的批评。何谓遽情?王夫之说:“导长者于迷,先之矣;拯溺者于渊,拯之矣;调病者于食,损之矣。先而不为不悌,拯而不为不仁,损而不为不惠,君子之通德也;先之而忿其傲,拯之而忌其凌,损之而怱其吝,小人之遽情也。”^{[4](P418)}遽情是一种急迫、怨愤、褊狭之情,遽情则无定。何谓淫情?王夫之说:“淫者,非谓其志于燕嫖之私也,情极于一往,泛荡而不能自戢也。”^{[4](P433)}“淫情”指情感的过度表达。“遽情”、“淫情”都表现出气矜、气激的特点,会导致情失于正,都是王夫之极力批判的“情”。与之相对,“贞情”、“裕情”是性之情,是君子应该秉承之情,王夫之说:“贞于情者怨而不伤,慕而不匿,诽而不以其矜气,思而不以其私恩也。”^{[4](P321)}可见,贞情、裕情是中和之情,中和之情即为性情。朱熹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不逾节,则性情之正也”^{[13](P205)}。

由上可见,王夫之所倡导的“情”不仅是对《诗序》“吟咏情性”的拟议,更多是对《诗集传》“吟咏性情”^{[14](P4)}的“拟议”。王夫之“《诗》达情”说中重点讨论的“贞情一淫情”、“遽情一裕情”、“公情一私情”的问题是在拟议宋儒“性情”说基础上,针对明清之际士人最为关注的时事和士风问题所进行的变化。这些问题在同时期其他《诗》学著作中也有所涉及,如贺贻孙《诗触》在《皇皇者华》篇论及“裕情”,他说:“有歉然有所不及之怀,则必裕然无所不及矣。”^{[15](P575)}在《采薇》篇论及公情与私情:“其言公义而本之私情,则章章有之。”^{[15](P578)}范王孙《诗志》论《北门》篇时说:“人臣之事君也,自靖自献,原不必求知于人。”^{[16](P417)}与王夫之所论一致。相比其他著作,王夫之的论述显得更具理论深度和系统性,应与他的“拟议变化”《诗》论观有关。“拟议变化”《诗》论

观使他能够摆脱传统的束缚,灵活自如的实现其通经致用的解《诗》目的。

四

王夫之之所以能够提出“拟议变化”《诗》论观,并对《诗序》有重多突破,与王夫之青年时期的思想渊源及壮年时期通经致用的治学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王夫之青年时期的为学经历受到阳明学及东林学派的影响,这一影响在《诗广传》中有多处体现。东林学派与阳明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东林学派实导源于阳明学,这一点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序》中有精辟论说:“余谓东林言‘是非’、‘好恶’,其实即阳明‘良知’、‘立诚’、‘知行合一’之教耳。惟环境既变,意趣自别,激于世缘,遂成异采。若推究根柢,则东林气节,与王门良知,实本一途。”^{[17](P19)}王夫之虽极力反对王学,但与王学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父亲曾从学于邹东廓的后人邹德溥,邹东廓是阳明重要弟子之一,深得阳明赞许。嵇文甫说王夫之“受王学的影响不少”^①,船山曾受知于东林领袖高景逸从子高汇旃,与东林党有密切渊源,秉承了东林党人对政治的高度热情。《诗广传》中高扬人道的天人思想与阳明学和东林党不无关系。明代中后期阳明学发展蔚为壮观,心学的昌大带动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尤其泰州学派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们肯定情识、张扬自我,人的价值被大大肯定。王畿说:“乾坤动静,神智往来,天地有尽而我无尽。”^{[18](P381)}吕坤说:“而今看着风云雷雨都是我胸中发出,虎豹蛇蝎都是我身上分来,那个是天地?那个是万物?”^{[19](P100~101)}他们都凸显了人在天地中的至尊地位。王夫之的“造命论”与东林党人表现出一致性,他说:“唯君相可以造命,岂非君相而无与于命乎?修身以俟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20](P37)}表现出极高的社会参与性。《诗广传》对“情”的高度关注与晚明受阳明学影响而产生的重情的社会思潮有关。王夫之在《王风·扬之水》中说“周以情王,以情亡”^{[4](P342)},与冯梦龙“王道本乎人情。不通人情,不能为帝王”^{[21](P456)}的说法极相似。《静女》篇论到“爱”“可生可死而灼然不叛,忘生忘死而莫能自名”^{[4](P328)},这一说法显然借鉴于汤显祖的《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22](P1)}冯梦龙与汤显祖都受到阳明学的影响,冯梦龙曾盛赞阳明“三言妙决致良知,孔孟真传不用疑”^{[23](P75)},汤显祖曾师从罗汝芳,与泰州学派的渊源自不用多说。

王夫之同明清之际的诸多遗民一样,把经学作为救世良方,治经是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清初大

家如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毛奇龄等著书无不出此意图。《诗广传》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王夫之对遽情、淫情的反对,正是出于对晚明竞躁士风的反思,期望于社风士气有所导引和矫正,他所表现出的对《诗序》相异或相反的解读,并非是他强说新词以相标榜,实为出于一片赤诚之心,有感而论。王夫之在《永历实录》中以“士风竞躁”^{[24](P530)}概括崇祯末年的士风。中晚明时党争蔚然成风,东林党与浙、齐、楚三党及阉党间的相互争斗构成了整个晚明“躁戾”的政治生态及话语环境。争国本、京察等对峙事件接二连三,君臣之间“相摧相激”^{[21](P301)}，“尊卑陵夷，

相矫相诤”^{[20](P239)}，“往往上以为宜详宜新之事，而下以为宜略宜仍之事；朝所为縲辱摈弃不少爱之人，又野所为推重恹叹不可少之人。上与下异心，朝与野异议。”^{[25](P371)}王夫之对士人的躁戾之气尤为痛恨，甚至把亡国的罪过归之于此，因此他在《诗广传》中对遽情和淫情的批判不遗余力。

综上所述，在“拟议变化”《诗》论观烛照下，王夫之沿着经世致用的解经思路，将《诗经》阐释与时代风气和政治紧密结合，能够对《诗经》学讨论的传统问题提出新见，开拓新的解《诗》路径，体现了明清之际遗民经学的学术风貌。

注 释：

- ① 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62年。陈来与嵇文甫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王夫之只能说吸收了王学

的若干思想观念，但笼统说受王学影响不少，是不太妥当的。

参考文献：

- [1] 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十六册)[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 [2] 高亨. 周易大传今注[M]. 济南: 齐鲁书社, 1979.
- [3] 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 [4] 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三册)[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 [5] 洪湛候. 诗经学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6] 钱澄之. 田间诗学[A]. 文渊阁四库全书 经部 78 册[C].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7] 孔颖达.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之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8] 朱熹. 诗集传[M]. 赵长征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9] 孙奇逢. 读易大旨[A]. 文渊阁四库全书 经部 33 册[C].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10] 黄宗羲. 黄梨洲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1] 陈确. 陈确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2] 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一册)[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 [13] 刘因. 四书集义精要[A]. 文渊阁四库全书 经部 196 册[C].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14] 朱熹. 诗序辨说[A]. 文渊阁四库全书 经部 63 册[C].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15] 贺贻孙. 诗触[A]. 续修四库全书 经部 61 册[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6] 范王孙. 诗志[A].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 71 册[C].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17]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 [18] 王畿. 龙溪王先生全集[A].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 98 册[C].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19] 吕坤. 呻吟语[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7.
- [20] 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十册)[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 [21] 冯梦龙. 情史[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6.
- [22] 汤显祖. 牡丹亭[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 [23] 冯梦龙. 冯梦龙全集(第十一册)[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 [24] 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十一册)[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 [25] 张廷玉. 明史[A].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史部 59 册[C].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Wang Fuzhi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positional changes to the *Book of Songs*

GAO Wen-xia

(School of Chines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Wang Fuzhi opens up academic researches o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Book of Songs* at the tur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reakthroughs are made on the his preface to *Book of Songs* because of the propositional changes. Wang Fuzhi makes a practical us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devoted to pragmatic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relation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Wang Fuzhi; *Preface to the Book of Songs*; propositional changes

[责任编辑 李 靖]